

「共和」的遺產

——民國初年文學與文化的非激進主義轉型

● 陳建華

摘要：從「共和的世紀」的當代關懷來回顧民國初期的「共和」理論與實踐，有助於對「正典」史觀的進一步祛魅，以及對辛亥革命的「遺產」提供新的思考面向。袁世凱帝制和張勳復辟迅速破滅，「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北洋軍政雖倒行逆施，但共和體制得以確立。更具深遠意義的是，在社會和文化領域，都市建設及其經濟、法律、教育等各行各業的現代化發展，如果沒有共和憲政和制度上的保證是萬不可能的。本文以1910年代中期上海的知識份子、文學與文化場域及都市印刷媒體為例，描述一種與《新青年》的激進革命路線不同的社會改良議程。在民初的政治危機中，一批「共和知識份子」轉向都市傳播領域，與商業、市民大眾共謀，創造出都市消閒文學、女性主體、家政文化和日常生活現代性等新的範式。他們以愛國憲政為立足點，以傳統與現代、理性與情感相融合的方式從事社會改良與大眾啟蒙，從而造成知識身份和文學文化的深刻轉型。

關鍵詞：共和 革命 南社 文學文化 社會改良

一 前言：「共和」的挑戰

2011年11月在關於拙著《從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電影和文化的轉型》的一次討論會上，美國韋斯里學院東亞系教授宋明燁指出該書關乎「範式轉型」問題，但「值得提出討論的是，對我們來說『革命』比較容易理解，而『共和』的概念在陳建華的這本書中語焉不詳」^①。筆者過去在「革命」的詞義方面做過一些研究，《從革命到共和》裏也有幾篇文章談到「革命」一詞在清末的翻譯過程，但對「共和」未作任何界定或探討，因此宋教授的確一語中的，對筆者來說不啻是個富於啟迪的挑戰。

這幾年「共和」一詞在中文世界似有走俏之勢，出現不少有關「共和主義」的研究著作，翻譯或著述都有^②。國際上亦然，「自20世紀80年代起，國際學術界開始關注『共和主義』，直到今天這樣的研究熱潮仍方興未艾」^③。中國是否有「共和主義」尚待研究，但有「共和」傳統是沒有疑問的。辛亥革命結束千年帝制，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哈佛大學中國研究講席教授柯偉林(William Kirby)在《不確定的遺產：哈佛辛亥百年論壇演講錄》一書中稱二十世紀中國是「共和的世紀」^④。辛亥百年已經過了好幾年，話題至今餘波蕩漾。辛亥革命是「不確定的遺產」的看法在學者中間似乎頗為典型。

然而，為甚麼「共和」就不是一筆「遺產」呢？其意義並不止「五族共和」，也包括憲法、政黨和代議制等，如有論者在解釋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時指出：「現代意義上的共和，強調所有公民參與國家的法律制訂，政策制訂和執行，包括直接參與和間接參與，比如公民表決、代議制等。」^⑤若從中國當代境遇來回顧民國第一個十年的歷史斷層，大約會帶來一些新的思考面向。

「共和」一詞早見於中國古籍，據《史記·周本紀》記載，西元前841年周厲王暴虐無道，激起國人起義，厲王出逃，國中無主，由周公和召公共同「行政」，史稱「共和」^⑥。至近代「共和」也像「革命」等詞一樣，經由日本的翻譯傳播，又返回中土，經過了一番消化吐納的複雜過程。據陳力衛考察，在十九世紀日本的多種英華詞典中，歐美政體的“Republic”已被翻譯為「民主之國」，而在中國王韜開始使用「共和新政」之詞，與西方式議會政體相聯繫。二十世紀初「新名詞」大量流行，「共和」幾與「民主」為同義詞^⑦。藍弘岳進一步梳理了二十世紀初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對「共和」概念的接受與挪用的情況，而通過雙方的爭論使「共和」觀念更廣為流行^⑧，他們各自所代表的革命派和立憲派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共和」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若隱若現，迄今沒得到充分重視，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說起民初的政治實踐，立刻就令人聯想到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和軍閥混戰，簡直無一是處；另一個原因與此相關，就是接下來發生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在現代思想史上披着「正典」的光暈，在思想史研究界向來唯馬首是瞻。因此，「共和」前比不上清末的「革命」，後為五四的「民主」所遮蔽^⑨。

其實，五四的「民主」與清末民初的「共和」在思想上一脈相承。早在1915年《新青年》第一期上，就刊有高一涵的〈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一文曰：「專制國家，其興衰隆替之責，專在主權者之一身；共和國家，其興衰隆替之責，則在國民之全體。專制國本，建築於主權者獨裁之上，故國家之盛衰，隨君主之一身為轉移；共和國本，建築於人民輿論之上，故國基安如泰山。」^⑩這篇文章以「專制」與「共和」的對立為論述架構，反映了當時的流行話語。

另如1917年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說：「俄人以莊嚴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滌俄國政界積年之宿穢者，間接以灌潤吾國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舊，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制之不可復興，即彼貌託共和之『官僚政治』，於今亦可不嘗試……今吾更將依俄國革命成功之影響，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勢力。」^⑪由此可見，在新的「思想革命」發

動時，與「共和」話語仍有很大關係。這種情況，如王汎森指出：「陳獨秀與陸續加入的幾位新文化運動領袖，都與辛亥革命有關，而他們也都牢守民主共和的理想」，至五四前後，隨着「《新青年》中社會主義的成份愈來愈濃」^⑫，他們的「民主共和的理想」發生了變化。

在西方，「共和」概念似乎難以界定，如劉訓練所言：「連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共和國之父、美國的第二任總統、三卷本論述美國憲法著作的約翰·亞當斯都抱怨說，他根本弄不清楚『共和』到底是甚麼。」^⑬在中國，「共和」詞義也含混而複雜，民國伊始章士釗就指出^⑭：

今之最時髦之名詞，莫共和若，而最爛污者亦莫共和若。軍隊之放縱者曰此共和也，學生之放縱者亦曰此共和也，從而矯正之者則曰：「軍隊無共和，學校無共和。」共和共和，天下悉假汝之名以行。……共和者乃政府之一種形式也，國採代議政治體，而戴一總統為首領，是謂之共和，無他說也，萬不可以作尋常狀物之詞到處濫用。

可見章士釗反對濫用「共和」，將其限定在政治領域中。

民初十年間的思想與政治領域以「共和」為中心，已不同於清末時期限於觀念及理論的譯介，而與政黨政治實踐密切聯繫在一起，使詞義變得十分複雜。它與「專制」相對立，也與「革命」大相逕庭。史無前例的政黨政治以「共和」的名義在一系列政治危機中由各黨從事政治理論探索和建構。章士釗固然是中國「政黨政治」理論的締造者^⑮，而其核心則是他的「共和」理念；雖然他不直接參與政黨政治，其政治理論卻離不開各派的「共和」政治實踐。另外如《世界共和國政要》、《歐美政黨政治》等出版物在民初紛紛出現，多屬知識方面的移植^⑯。

而在中國語境裏，「共和」受到各黨政治議程、傳統政治文化及社會心理的制約，衍生出無數富於中國特色的變義。如代表反清革命的孫中山、戴季陶等人的「共和」論述中，那種強調「主權在民」的民粹主義傾向與「革命」難分難解。「共和」也並不妨礙康有為的君主立憲夢想，所謂：「君主之有無存廢不足輕重，不足計較有無也。故英立君主，美法不立君主，而同為共和，無以異也。」^⑰這裏透露出當時對「共和」的「形式」與「精神」的不同詮釋。1915年梁啟超創辦《大中華》雜誌，對「共和」一詞躲躲閃閃，而在「護國」之役中則以拯救「共和」自任，再度發揮其帶有感情的修辭力量，使「共和觀念深入人心」^⑱。袁世凱死後，無人再敢言帝制，為北洋當局出謀劃策的安福俱樂部也打出「以保持統一，鞏固共和，勵行憲政，保育民生為宗旨」的旗號^⑲，雖專制之心不死，卻不得不依循「共和」的遊戲規則。這些「共和」話語涉及憲法、政黨、政體和國體等重要政治概念，與近代世界政治經驗相聯繫，在具體脈絡中與政黨立場、知識譜系、話語場域及社會、文化等要素相關，呈現極其複雜的形態。

「共和」的意涵依附於實踐，儘管其表述千姿百態，實際效應各異，但它代表一種理念，在與「專制」相對的意義上，始終保持其基本價值，體現出觀

念的力量。事實上，民初「共和」概念並不限於政黨政治的實踐，如上引章士釗的「軍隊無共和，學校無共和」等語所提示，「共和」概念影響到社會各階層，在使用中被轉換成比喻或象徵符號，與「民主」、「自由」、「平權」等概念密切扣聯，成為公共認知與大眾欲望的巨大場域。美國中國現代史學者史謙德 (David Strand) 在其近著《未完成的共和》(An Unfinished Republic: Leading by Word and Deed in Modern China) 一書中，把當時女子參政同盟會會長唐群英在參議院掌摑宋教仁 (因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沒有承認男女平權) 視為一個象徵性例子，認為由是帶來一種「新型的政治」。儘管辛亥革命之後新的政體建設步履艱難，但從尊卑和男女之間政治平權這一點看，無論就其價值還是日常實踐而言，如唐群英等人所領導的女子參政運動激發出巨大的社會活動與公共言說的能量，確乎改變了傳統的價值觀念與政治秩序^②。

從「概念變遷」和「制度移植」的觀點看從「革命」到「共和」的範式轉型，有縱、橫兩個維度。從縱向維度看，「革命」，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在中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誠如《易經》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道盡底蘊。「革命」挾持着天意民心，構成中國的政治文化與歷史哲學，其核心是專制、暴力與群眾運動。而「共和」雖然借自古語，但它進入中國現代史可說是無根之木。「共和」孕生於清末革命，在二十世紀中國與「革命」難以分割，而在民初的一段時間裏，它不僅反對「專制」，且竭力避免或反對「革命」。從這一點說，辛亥革命是一種意志的選擇——選擇一條全新的民族道路的意志，其意義不是一天兩天能說得清楚。

「共和」不僅在與「專制」的對抗中彰顯其意義，更重要的是在與「革命」的區別中顯出其價值，即摒棄暴力、專制，以平和、理性的手段建立體現民主、公平的政治制度、法律程序和社會機制。在這裏一個突出的現象是，「革命」話語在晚清通過世界革命的翻譯，轉換成各種現代形式，儘管梁啟超試圖把「革命」意涵轉化為日常漸進的改良^③，但在民初，甚至在現代中國，「革命」仍以傳統方式回應現代世界，基本上保持了其暴力變革的方式。「共和」與「民主」是一體的兩面，民初的「共和」實踐顯示出政治建制過程的脆弱性，其中包括如何體現「民主」的難題。這方面「革命」話語在清末經歷了現代性的內部轉換，如孫中山自稱為「革命黨」所示^④，一旦失去「天命」的制約，而以「正統」自居，遂使政治專政與民粹主義相結合，成為歷史的強大動力 (這也解釋了《新青年》何以從「共和」朝「民主」邁進而迅速獲得話語「領導權」)。這意味着「革命」現代話語的進一步開展，在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潮推動下，使中國沿着以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為特徵的「根本改造」的方向前進，此即與「共和」性質不同的具革命性的「民主」實踐。

另一方面，從橫向維度看，民初的北洋各派系不斷玩弄機制運作，踐踏「共和」理念，致使共和建制步履艱難，固不能辭其咎，但即使說共和機制徒具形式，對於「制度移植」而言，這「形式」也是個不小的成果。「共和」的理論與實踐不限於政治層面，更具深遠意義的是在社會和文化領域，尤其在半殖民上海，都市建設及其經濟、法律、教育等各行各業的現代化發展，如果沒有共和憲政和制度上的保證是萬不可能的。事實上，通過上海圖書館的「民國

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對「共和」一詞作搜索，即得3,626條²³，可見當時儘管處於不斷的革命和戰爭，「共和」觀念仍在人心，共和機制與歷史現實相依存。

這裏舉一個不為上述數據庫涵蓋的材料：1920年6月1日起《申報》開設〈常識〉版，由楊蔭杭專任評論，沈信卿、徐忍寒任編輯，設有常評、法律、經濟、道德、衛生、科學、問答等專欄²⁴，每日出刊，延續了數年。其發刊詞指出：民國「由二千年古國之文化，配合歐美共和國之文化而產生，忽忽九年，擾攘紛紜，迄無寧歲」。意謂共和國正處幼年，如「學齡」兒童亟需現代政治文化的知識啟蒙，因此「本報同人，念民國保育之責，不當希望政府，當由國民自任」²⁵。此時北洋政府臭名昭著，共和政體屢遭挫折，但楊與《申報》同人並未喪失信心，所謂「不當希望政府，當由國民自任」，也是自覺以和平方式從事一種社會的啟蒙運動；而「配合歐美共和國之文化」，則說明他們在努力實踐某種「公民社會」的建設。楊是立憲共和的實踐者，早年在上海鼓吹民主革命，遭清廷通緝而逃亡海外，先後在日本和美國獲法學學位。他在評論中直斥北洋軍政當局「喪心病狂」，甚至聲稱要「取消北京政府」²⁶，可見他對現存政權失望到了極點。但楊仍竭力維護「共和」理念，向國民宣傳憲法、選舉等知識。

因此，研究民初的「共和」論述及其實踐對於評估辛亥革命以及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之旅來說，是十分必要的。因其「失敗」而忽視之，這並不是對待歷史的應有態度，實際上仍因循了關於「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的二元思維慣性。本文不可能對「共和」的歷史作全面探討，僅將「民初」限定於民國建立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主要就1910年代中期上海的知識份子、文學與文化場域及都市印刷媒體舉例，重在說明一種與《新青年》不同的社會運動，即在民初的政治危機中，一些知識份子轉向都市傳播領域，與商業、市民大眾合作，以愛國憲政為立足點，以傳統與現代、理性與情感相融合的方式從事社會改良與大眾啟蒙，從而造成知識身份、文學文化的深刻轉型。

二 與市場、讀者聯盟

事實上，歷史不可能切斷。「清末民初」已成慣用語，多半相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而言，被蒙上新舊之分的思想陰影。的確，且不說主宰清末思想主流的「革命」意識形態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現，在好些地方清末與民初一脈相承，就像清末時「共和」思想已在傳播，民初的某些政治實踐是清末新政的延續。就上海而言，在日常生活與商業機制方面，1909年的《圖畫日報》中出現「時道」、「時趨」等新詞，圖示了婦女服飾的時尚趨向，這與商業消費掛鉤，也說明女性公共空間的形成，儘管這一公共空間的開拓者是妓女。另外，《申報》的文學副刊和《點石齋畫報》、韓邦慶的小說《海上花列傳》、李伯元辦的《遊戲報》等，都標誌着都市消閒風氣與文藝商品的成長；當晚清「新小說運

動」興起，小說市場風起雲湧，更促使文學市場的商業化與文學的專業生產。至於在文學上更不用說，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已打破關於晚清小說的成見，認為其成就不光僅如魯迅所說的「譴責小說」，如言情、狹邪、科幻等類型多姿多彩，足具典範，其「現代性」意涵更影響深遠²⁷。

但是，正是辛亥革命把「清末」和「民初」劈為兩半，迎來歷史的新紀元；以「共和」的名義，向專制、向革命告別，開闢了一條通向民主、自由、平等的中國道路。所謂「轉型」的依據，乃在於「共和」主體的合法性，必將從層層迷思的包裹中破繭而出。辛亥革命的成功一洗瀰漫於清末的民族屈辱感，帶給國人一種自豪和信心，如1912年由南社發起成立國學商兌會，南社發起人之一高旭表示：「今幸民族朝政，頓異曩昔，則吾社之宗風大暢而未盡者，非政治之發揚，乃在道德與文美耳。」後者「性質最為高尚，實含有世界至善之性質」²⁸。由於民國更始，這番發揚「國粹」所具有的世界視域，光景氣象不同往昔。與此相似，1915年3月吳承烜的《小說新報》發刊詞曰：「星雲糾縵，新民國之典章；日月升恆，新中華之氣象。」²⁹民初流行駢文，爭相用優美高雅的語言來表現新的民族主體，以致善寫駢文的作者炙手可熱；不過到後來人們疾古如仇，把這一層意思給遺忘了。

對於民初的文學文化新景觀，筆者在《從革命到共和》及近年一系列文章中已有所論及，在這裏不擬重複³⁰。若簡單舉個例子，只要稍加對比同名為《女子世界》的雜誌（分別出版於1904和1915年），就可發現兩者的明顯差異。清末的《女子世界》以提倡女學為主，充滿愛國激情；而民初的《女子世界》，如東園的〈女子世界弁言〉中有「芙蓉半面，炫美女之新妝」、「豔體猶存，勿謂雅人所廢」等語³¹，卻標榜女子裝飾打扮和私人情感的表達。雖然女性的主體呈現都離不開男性的操縱，卻也反映了「革命」與「共和」的不同價值取向。在筆者的論述中，對文本的選擇與詮釋無疑受制於主觀判斷，但經過甄別選擇，一種新的歷史軌跡將被揭示出來。如語言學家和文學理論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說：「在某個時代的藝術（被看做特殊的整體）中，我們也可以找到一種主導成份」；代表文藝復興時期最高美學標準的是「視覺藝術」，其審美原則體現在各種文藝形式中³²。簡言之，在民初的文學文化中，一種「共和」主體精神發揮了「主導」作用，即回歸到人性和日常生活，尊重個人、男女平權與家庭價值，並使文學藝術回復其美學身份，注重抒情傳統的現代轉換，更廣泛地體現為中西相容、新舊兼備的「國粹」文化政治。

從晚清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就上海文學期刊而言，1902至1909年晚清「小說界革命」時期共出版了20種，而從1910至1921年出版了52種，特別是1914與1915年這兩年裏一下子卻冒出了30餘種³³。在近年來方興未艾的「通俗文學」研究中，這些雜誌被視為「鴛鴦蝴蝶派」文學刊物，代表了「市民化」或「世俗化」傾向，這並無疑問；但本文試圖更貼近歷史現場，尤其在思想和文化的脈絡裏提到這些雜誌與南社的關係。在清末民初，上海的報紙期刊大多由南社成員掌握，如鄭逸梅後來回憶說：「南社人文匯集，民初的各種刊物，幾乎成為南社的世界。」³⁴據學者樂梅健統計，1912至1916年間上海出版文藝期

刊達36種，有姓名可考的編輯隊伍裏，南社社員就佔了一半以上^⑤。南社社員大多具民主共和思想，如在民初這一波文藝雜誌當中，《小說時報》、《婦女時報》和《小說大觀》的主編包天笑即是個「共和」吹鼓手；在1911年武昌起義之後，他在《時報》上為「革命軍」搖旗吶喊，在〈共和與專制鬥〉中說：「二十世紀者，專制政體將絕迹於地球之日也。革命軍之以提倡共和為宗旨，固已探得驪珠也。以共和與專制鬥，所以各國不敢以尋常內亂視革命軍也。」^⑥

把「共和」與「專制」對應的用法在當時很普遍，不光是南社，如上文所引《新青年》中高一涵之文，很大程度上也是知識界的共識。「共和」指政體，也包含憲法中關於民權、平等、自由的種種許諾。相關的詞語使用常見於一般報章書刊，如「近因歐風東漸，文明日進，國體共和，實行自由」^⑦，或如「共和時代，男女平權，歐風東擲，美雨西連，世界潮流，皆為所牽」^⑧，這類例子不勝枚舉。

1910年代中期上海的文藝雜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一突發現象多半與南社的內部分化有關。南社是個與反清政治力量結盟的文學社團，在文化上張揚「國學」，其成員大多具有傳統文士留連詩酒的浪漫氣質。南社名義上是個全國性組織，人員廣泛而龐雜，卻不具政治實力，因此在袁世凱企圖稱帝之際處於「革命」與「專制」之間難於適從的窘境。一方面南社成員大多接受晚清民主、自由思潮的影響，擁護「共和」而反對帝制，另一方面也不認同「革命」，當柳亞子大聲疾呼「二次革命」時，社員反應冷淡。1913年春宋教仁被暗殺，同年9月寧調元被當局槍殺，反袁鬥士紛紛遭迫害，共和憲政遭到踐踏。柳亞子《聞寧太一噩耗痛極有作》云：「當年專制猶開網，此日共和竟殺身。」^⑨宋、寧皆屬南社中堅，皆有功於革命，卻遭慘死；辛亥迎來的「共和」卻比滿清前朝還專制，這讓人難以接受。柳在極度悲憤中對「共和」表示的不僅是失望，也是對歷史的無奈。

然而1914至1915年間在「專制」的烏雲密布中冒起的雜誌浪潮，卻意味着某種文化上的深刻轉型。那些由具有共和思想的南社成員主持的雜誌，如包天笑的《小說時報》、《婦女時報》、《小說大觀》等，王鈍根、陳蝶仙、周瘦鵑的《遊戲雜誌》和《禮拜六》，徐枕亞、吳雙熱的《小說叢報》等，都代表着當時文學與文化新傳播的主流。另如劉鐵冷、蔣箸超的《民權素》，陳蝶仙的《女子世界》，王文濡的《香豔雜誌》，姚鵠雛的《春聲》等，推波助瀾，遂構成一股文化新潮。雜誌的繁興不全與政治高壓有關，從遠因來看也是科舉制度被取消之後文人轉向都市印刷媒體的職業選擇。1914至1915年間三十餘種雜誌的文學風格與文化姿態各異，共同趨向是去革命化或去政治化，其中帶着政治上的挫折與幻滅感，或傳統文人的顧影自憐與風流自賞；然而一旦走上文化生產的軌道，必然受到商業的競爭機制與都市受眾取捨的制約。事實上，在運營過程中，作者與消費機制、讀者在不斷磨合和調適，雜誌是這三者共謀協商的場域，其文化產品被賦予社會意義，商業上的成功往往投合了大眾的生活欲望與消費習性，由是催生出一種新的都市意識形態的文化範式，文人身份也隨之發生變化。

三 從政治轉向「遊戲」

創刊於1914年4月的《民權素》雜誌顯然是政治壓迫的結果。其前身《民權報》為新成立的國民黨的喉舌，一貫揭露與抨擊袁世凱。報館設在上海租界，袁無法直接干涉，於是下令各地禁止銷售，郵局停止寄發，《民權報》終於停刊。報紙同人後另組民權出版社，出版文藝性的《民權素》雜誌，每月一期，主編之一蔣箸超，原來即負責《民權報》文藝副刊。蔣在《民權素》序文中沉痛表示：「革命而後，朝益忌野，民權運命，截焉中斬。」報紙停刊意味着「民權」的挫敗，失去了政治鬥爭的陣地，他「循文士之請」而轉辦《民權素》，感到傷感與無奈，認為文學創作「究而言之，這錦心繡口者，可以遣晨夕，抵風月，於國事有何裨焉」^④。這裏流露出傳統士人重視事功而視文學為「雕蟲小技」的看法。另一序文的作者徐枕亞，亦屬《民權報》班底，因連載《玉梨魂》而名聲鵲起。當時他儘管情緒低落，仍不失希望：「然而我口難開，枯管無生花之望；人心不死，殘編亦碩果之珍。是區區無價值之文章，乃粒粒真民權之種子。……則《民權素》之刊，是又烏可以已乎！馬死有骨，豹死有皮，民權死而有素焉，民權其或終於不死乎。」^⑤文章無價值，但只要保留着「真民權之種子」，就難保來日又開出民權之花來。這種樂觀態度在報社同人胡常德的序文裏表達得更為明確。他說《民權報》「以種種困難故而猝然中止，閱者或喟焉惜之。吾諸同志因是心猶未已，思得當以圖恢復，倘機緣可遇，行將搜羅傑構，餉我同人。顧此後日之事，吾人當畢力營之」^⑥。「以圖恢復」宣示其政治意圖，同時勉勵同人「畢力營之」，似具戰鬥色彩。

《民權素》設置的欄目琳琅滿目，如名著、藝林、遊記、詩話、說海（即小說）、談叢、諧藪、瀛聞、劇評、碎玉等。其中「諧藪」屬滑稽文類，刊於第一期的幾篇文章政治諷刺極其鮮明。吳雙熱的〈戲為鼠界作討貓檄〉把清廷比作「惡魔王狸奴者」，把百姓比作「鼠」，所謂「飽暖思淫，貪婪無厭，窺伺我窟穴，仇視我種族，蹙我生機，制我死命，肆其威武」，固然在革命聲討清廷的罪惡。然而，有些句子如「僭位者於今四千餘年，嗟我子孫，浪死者不下億萬斯眾」^⑦，就超出了清王朝而囊括整個中國的專制統治了。徐枕亞的〈水族革命記〉是影射辛亥革命和袁世凱的寓言。文章將中國比喻為海底的「涼血動物」，而在世界風潮鼓動之下，墨魚、蛙、蚌等整個水族大鬧革命，一舉推翻龍廷，共推鯨魚為大總統，建立了水族內閣，從國務總理、外交總長、陸軍總長等，均被比作可笑可惡的海底家族，「多言蝦蟆，箝口如蛤蜊，均得為參議院議員」，或「卑賤如烏龜，亦得為軍警督察長」，諷刺十分辛辣。文章的寓意是革命雖然成功，舊制度卻依然故我，換湯不換藥。最後，「枕亞曰：哈哈，世界著名涼血動物，居然也要革命，革命居然成功，貪如鯨者，居然為水國大總統矣。所引用者，無非龍王之舊臣，龍族之餘孽。嗟爾水族，汝等脫離龍王之專制，不知又入於暴鯨之口矣。欲享共和幸福，豈非夢想？吾不禁望洋向若而嘆耳。」^⑧這番自我總結更增強了抨擊袁世凱的主題。

吳雙熱、徐枕亞的文章含有對辛亥革命的反思，觸及根深蒂固的政治專制問題。另如包醒獨的文章則反映了國民性的問題。他在〈黑甜鄉記〉中把中

國社會比作「睡鄉」，大眾渾渾噩噩，酣睡不醒，軍政當局腐敗不堪，行屍走肉，政客在「尋夢」。不光世俗世界，整個民族「以善睡為主義，道家宗陳搏，釋迦宗眠佛」。其背後的心理機制與宗教思想有關。該文最後說：「嗚呼，睡鄉之民俗凋疲也如彼，睡鄉之民情頹廢也如又如是，客果未之前聞乎？醒獨亦睡鄉中人也，以獨醒不容於鄉，故常作他鄉遊。」⁴⁵對於這樣的民眾，作者深感失望，既不能見容於睡鄉，遂一走了之。

這些文章「諧」趣十足，內容卻相當嚴肅。徐枕亞描寫的「涼血動物」與包醒獨筆下的「凋疲」、「頹廢」的「睡鄉之民」異曲同工，都指涉麻木的國民精神，包括吳雙熱的中國四千餘年專制之論，多少含有文化反思之意。包醒獨筆下的「睡鄉」頗似魯迅的「鐵屋子」，作者意識到自己也生活其中，卻取獨善其身的態度，而不像魯迅要盡綿力來喚醒沉睡的國民。這些文章原來散見於《民權報》副刊中，此時舊文重刊，收羅在一起見證歷史，保留了集體的革命記憶，這些作者曾為民國的誕生奔走呼號，當民主陷入低谷、專制囂張之時，仍在堅持「共和」的理想。

至1916年4月，《民權素》共刊出十七期而終止。雜誌中不乏感時傷政、緬懷革命之作，如章太炎的〈獄中與威丹聯句〉體現了當初他與鄒容反抗專制的卓絕鬥爭及他們對民主共和的理想⁴⁶，但實際上這種理想與政治現實漸行漸遠，即使對於袁世凱稱帝和轟轟烈烈的護國之役也不興波瀾。如蔣箸超所形容的，「雕蟲小技」、「錦心繡口」似乎決定了雜誌的文藝導向。然而自清末以來似乎還沒有出現過像《民權素》那麼具精英格調的文藝園地，如置於首位的「名著」欄中經常有章太炎、林紓、王闓運、樊增祥等名流之作，顯出一種超黨派的純文藝色彩——也是某種「共和」精神的體現。眾多的欄目幾乎一成不變，以詩文為主，全是文言。如果說「諧藪」和「說海」較有趣味或娛樂性，那麼它們也僅佔極小部分。《民權素》辦不下去，有經濟上的原因，主要缺乏來自市場的支撐；而且在雜誌開辦一個月之後，徐枕亞和吳雙熱另起爐灶而創刊了被視作「鴛鴦蝴蝶派」之始的《小說叢報》，這對《民權素》當然也是個不利因素。

相比之下，王鈍根等人主編的《禮拜六》週刊是個成功轉型的例子。王是個基督徒，政治上無黨派背景，卻具強烈的共和意識；辛亥革命前夕《申報》開闢〈自由談〉副刊，由王主編，以「遊戲文章」為首要欄目，批評時政，嬉笑怒罵，投合大眾趣味，卻開創了一種以文學風格為中介、以理性溝通為基礎的「批評空間」⁴⁷。1912年10月〈自由談〉另設「自由談話會」專欄，比「遊戲文章」更直接議論袁世凱專制，同時也不贊同「二次革命」，站在市民大眾的立場上體現了商報的「中立」立場⁴⁸。「自由談話會」的投稿者大多為平頭百姓，有意思的是，從1913年3月起陸續刊出他們的肖像照，約一年間共達一百餘名。從所附簡歷來看，大多是文學青年，包括少數女性，屬小資知識階層。這凸現了〈自由談〉這一輿論空間的草根性，蘊含着王鈍根的某種平民共和的理念。

顯然是由於受到當局壓制，「自由談話會」難以為繼，於是王鈍根在1913年9月另創《自由雜誌》，他在序文中說⁴⁹：

自由談者，救世文字，而非遊戲文字也。雖或遊戲其文字，而救世其精神也。慨自時局紛亂，約法虛設，所謂言論自由者，孰則能實踐之？或徇於黨見，或困於生計，或屈於權威，雖有慷慨激昂之士，欲為誅奸斥佞之文，在勢有所不能，在情有所不便，乃不得已而託於遊戲文字，以稍抒其抑鬱不平之氣，而彰善瘴惡之義務，亦於是乎盡。……夫不名「遊戲雜誌」，而名「自由雜誌」，命名之意，蓋為忠言讜論，既不見容於今時，則不得不變其術，以求伸言論之自由，猶如骨鯁在喉，惟此雜誌可容一吐耳。

王在「遊戲」與「自由」之間吞吞吐吐，但畢竟以「自由」命名雜誌，實即在實踐「言論自由」，心懷「救世」而一吐為快。如《自由雜誌》編輯童愛樓在〈專制傳〉和〈除三害說〉兩文中把「專制」比作「惡獸」，在〈除三害說〉中形容它「頭若笆斗，眼如銅鈴，口有鋼齒，食人則骨肉俱糜。足有鐵爪，氣有毒汁，心有毒謀」^⑤，不言而喻，這「惡獸」非袁世凱莫屬。其實在專制大施淫威之時，如此標榜「自由」就是罪過。《自由雜誌》最終僅出版了兩期，便被迫停刊^⑥。

王鈍根並未因此歇手，卻從「自由」轉向「遊戲」。1913年底，《遊戲雜誌》月刊見世，由王鈍根和陳蝶仙合編；1914年6月又創辦《禮拜六》週刊，與周瘦鵑合編。陳和周都擅長言情小說，前者在《申報·自由談》連載小說《嬌櫻記》、《黃金崇》而名噪一時，後者此前憑《小說月報》上發表《愛之花》劇本而一鳴驚人。王鈍根離開〈自由談〉後，陳、周相繼擔任該刊的主編。他們在觀念上更為西化，更具活力和生意頭腦，在民初文壇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們其實都是〈自由談〉出身，但後來被稱為「禮拜六派」，是因為《禮拜六》見世後即受大眾歡迎而暢銷之故。

《禮拜六》明確聲言將娛樂性發放到首位，淡出政治。周瘦鵑說刊名效法美國《禮拜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意謂在週末閒暇之餘為讀者提供閱讀之樂^⑦。王鈍根在〈禮拜六出版贅言〉中標榜該雜誌的「新奇小說」、「輕便有趣」，作為一種週末消遣，比「戲園顧曲」、「酒樓覓醉」及「平康買笑」更為健康而省儉^⑧，似乎不失「寓教於樂」的古訓。然而，他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共和」觀念的新的實踐，帶來更為深刻的變化。《禮拜六》與都市的工作時間及其生產機制相扣聯，以工薪一族為目標讀者，由是決定了它與都市日常生活的密切關係。事實上，繼《遊戲雜誌》之後另創的《禮拜六》在版面上大力革新。在欄目設置上，《遊戲雜誌》一般包括圖畫、滑稽文、詩詞曲選、談叢、譯林、小說、樂府、新劇等，與《民權素》相似，趣味性已見增強，但是《禮拜六》幾乎全是小說，創作與翻譯並重，也不排斥白話，據說一見世便「轟動一時」，銷數達二萬以上^⑨。王鈍根向讀者推薦《禮拜六》，說它比其他娛樂樣式更有趣、更有益於身心。勸說口吻包含着雜誌、作者與讀者的契約關係。這不僅意味着知識份子放下身段，對於「文以載道」的傳統也是個轉折，這就不同於梁啟超與五四一代的「通俗」態度，即把大眾看作落後的、有待改造的，似乎理所當然地要把觀點或思想強加在他們身上。

對於《禮拜六》的西化和啟蒙的特徵，學者作了不少研究⁵⁵，這裏不必贅述。單以周瘦鵑為例，《禮拜六》幾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如筆者在一些論文裏指出，在1910年代中期他的小說寫作非常旺盛，包括創作、翻譯和「偽翻譯」，主題方面，有的宣揚具有超階級、超民族的「高尚、純潔」的愛、有的表現法國大革命的血腥殘暴、有的講拿破崙傳奇，一反以往英雄崇拜的寫法，而把他還原為一個七情六欲的血肉之軀，折射出大眾的世俗欲望⁵⁶。某種意義上，周瘦鵑是個「共和」意識形態轉型的代言人。

四 女子參政運動

晚清時期以《女學界》、《女子世界》等雜誌為代表，女權意識高漲，以廢纏足、興女學、種族革命、家庭革命等議題為主，涉及男女平權、自由戀愛等問題。而1910年代中期如《婦女時報》、《婦女雜誌》、《中華婦女界》、《女子世界》、《眉語》、《鶯花雜誌》等或以女性為主體，或直接由女性主編，興盛一時，在民初不再以「革命」為號召，抱着「共和」對男女平權的期許，各自開展社會改良的議程，重塑以家庭為中心的女性角色。首先在政治領域中，婦女參政運動為爭取男女平權發出強音，且產生深刻的社會影響。

民國成立伊始，婦女團體極為活躍。原先在反清運動中就有各種女子軍隊，如女子革命軍、女子北伐隊、女子軍事團、女子暗殺團等可謂風起雲湧。革命結束後，女子軍隊即被南京臨時政府解散，一些女子軍隊的領導者轉而掀起女子參政運動，紛紛建立各種團體，一時間轟轟烈烈。她們自覺將女權運動轉入體制內運作，這對於從「革命」到「共和」的範式轉換足具象徵意義。她們以英美等國的女子參政運動為榜樣，其中要數唐群英、張漢英為首的女子參政同盟會最為勇敢。她們發現《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公布時沒有寫進有關男女平權的條款，遂上書孫中山要求修正，並大鬧南京參議院，打碎玻璃窗；後來國民黨成立，也沒有承認男女平權，唐群英當面責問宋教仁，且怒擱其頰⁵⁷。這方面學者作了許多研究，但很少關注當時報刊雜誌傳媒對於女子參政運動的推動作用。

著名的〈女界代表張群英等上參議院書〉於1912年6月發表在《婦女時報》上⁵⁸：

茲幸神州光復，專制變為共和。政治革命既舉於前，社會革命將踵於後。欲弭社會革命之慘劇，必先求社會之平等，欲求社會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權。欲求男女之平權，非先與女子以參政權不可。……請於憲法正文之內，訂明無論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標題中「張群英」是誤書，大約把唐群英和張漢英誤合為一人。該刊主編包天笑，與唐、張兩人都屬南社成員。同期還刊登了以林宗素為代表的另一個女

子參政組織的〈女子參政同志會宣言書〉⁵⁹。其實在一年前，即1911年6月《婦女時報》創刊號上已登刊了六張題為「英國婦人參政權之領袖」的照片，其時辛亥革命尚未發生。清末時期金天翮在《女界鐘》裏已提出「女子參預政治」的主張⁶⁰，報章雜誌也不時披露歐美等國婦女參政運動的情況。

《婦女時報》大力支持女子參政運動，幾乎每期都有這方面的文章，從外文資源介紹歐美各國女子參政的歷史與現狀。其中，周瘦鵑的〈泰晤士河畔女子要求參政之怒潮〉一文翻譯介紹了二十世紀初英國由潘葛司(Emmeline Pankhurst，又譯潘克斯特)所領導的女權運動⁶¹。1903年她建立了女子社會政治聯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為爭取女子選舉權與當局作抗爭，長達十餘年，鬥爭方式頗為激烈，常常砸碎玻璃窗，攻擊警察，因此她本人二次入獄。在周翻譯這篇文章時，英國的女權鬥爭其實尚未得到勝利(到1918年英國方通過法案，給三十歲以上的女子以選舉權)，但周文最後一段針對中國女子參政運動的話說得激情洋溢⁶²：

今我國隆隆春雷，亦已發大聲於海上。一般女子，漸有政治思想，印入腦海之中。因達譯之，以紹介於我女同胞之前。為告諸君，幸各加勉，以底於成，勿徒囂囂然為無謂之周旋。非盾以堅厚之實力不為功，其毋為彼歐西女子所笑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記者當拭目以觀女政治家翩翩而登二十世紀之舞台。

周瘦鵑無條件支持女子參政運動，並告誡「勿徒囂囂然為無謂之周旋」，意謂要像英國女子一樣走「實力」路線。事實也是如此，如上文提及林宗素的〈女子參政同志會宣言書〉所示，她面見孫中山，獲得他對婦女參政的口頭支持，結果被認為沒有法律效力，林在宣言書裏的辯解總是顯得軟弱。積極支持女子參政是《婦女時報》的一貫立場，即使在袁世凱肆虐之時也沒有中斷。1916年6月袁死後由黎元洪任總統，包天笑的〈編輯室之談話〉就此評說：「黃陂柄國，共和再造。舉凡約法上付與吾人言論之自由，今皆復活矣。」包雖然表達了過多的樂觀，但至少在袁之後「共和」體制是保住了。他還表示「蓋本報固極端主張女子參政論者，前報俱在，可以復按，今亦猶是，且將取積極主義焉」，因此希望「我富有政治思想之姊妹，亦能發抒偉論，鼓舞思潮」⁶³。其實在清末時期他即在鼓吹「共和」，如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季家珍(Joan Judge)的研究所示，約十年之前包天笑擔任《時報》主筆時，就和陳冷一起為開拓中國現代報刊的言論空間作了不少貢獻，這後面有着「共和」觀念的支撐⁶⁴。

五 餘論：走向都市日常現代性

包天笑被稱為「通俗文學之王」⁶⁵，的確名至實歸。首先，其主編的《婦女時報》關於女性在公共領域裏的角色塑造，如刊發女子教育、女子北伐軍的照

片等，仍留有晚清時代的餘緒，然而總體上以「發揚舊道德」、「灌輸新智識」為宗旨⁶⁶，以理性表述代替了清末革命時代的浪漫激情，如大力支持婦女參政運動意味着主張改革現存體制、關注底層女工狀況等含有更廣闊的「社會」視域⁶⁷。對於都市新文化空間來說，更具決定意義的是由女權爭論轉向以女性身心為核心的日常生活實踐。《婦女時報》通過大量源自日本、歐美的譯介，從個人衛生、體操、飲食、心理、妊娠到嬰兒養育等方面介紹知識與經驗⁶⁸，旨在形塑現代「國民之母」的觀念，而有關「賢母良妻主義」、「理想新家庭」的討論，則蘊含着發展都市「核心家庭」的空間想像⁶⁹。

此外，包天笑又以女性為象徵符號來打造「時尚」世界，對於後來的都市雜誌產生範式性的影響。在清末，女性的自由解放很大程度上得滿足「革命」的要求，如金天翮在廣為傳播的《女界鐘》中力言「裝飾之害」，反對女子在服飾、化妝、髮髻等方面「花樣翻新」⁷⁰。而《婦女時報》則打破革命禁忌，在創刊號上刊出一張題為「歐洲女子最時式之大帽」的照片，另有〈紡綢衫之話〉、〈婦女與紙煙〉等文。〈上海婦女之新妝束〉一文言及街市風景中婦女購物與生活習慣的新動向：「婦人之妝束，最足翻新花樣者，莫如頭髮，即劉海髮一種，亦有種種之不同，有尖者，有圓者，有高者，有平者」，又說：「日來時尚女子之衣以短為美觀，……有短至二尺以內者，殊不雅觀。袖短亦在臂彎中，此風以女學界中為最甚。」⁷¹這篇短文及頭髮和髮髻、短衣和鞋履的式樣，評判中不無道德焦慮，但也只是不滿其過度表現而已。「時式」、「時尚」之類的關鍵詞則暗示了雜誌的消費導向，後來《婦女時報》上各國女子髮型、裝束及帽子新款的照片愈益增多，而〈女界之裝飾與國家經濟談〉等文則涉及女性的消費經濟⁷²。

包天笑進一步結合商業機制與視覺技術來拓展女性的公共想像空間。如1911年9月《小說時報》第12號封面，一女子坐在地球光道上，手執黃龍旗。不久進入民國，在1912年4月第15號的封面上則是一女子手持代表民國五色條紋的燈籠。這裏把女性作為國族的象徵，不外乎是「國民之母」觀念的視覺表現。有趣的是在歐戰之前，英、德、法等國在發明和研製飛機、飛艇方面展開激烈競爭，中國人對此特別着迷，有關報導充斥於報刊雜誌。包別出心裁，如1914年11月《餘興》雜誌（附屬於時報館的消閒雜誌，也由包主編）第4期中有一幅題為「將來之時報」的圖畫，一女子在空中駕馭着雙輪飛機，手執一份《時報》。這張圖為祝賀《時報》創辦十周年而作，不消說具廣告性質，而「將來」則含意深長：希望中國人自己能造飛機，當然也想像會有女飛行員，其中不無未來中國主宰空中的願景。事實上，在《小說時報》中反覆登刊「金閨名花」乘飛車之類的照片，都是妓女在照相館拍攝的⁷³。包後來回憶說，在雜誌中刊登「時裝美女」照相是個新主意，當時一般婦女不肯以色相示人，於是通過給妓女免費拍照的辦法來獲得照片⁷⁴。1915年8月包創刊《小說大觀》，大登特登這類「名花」的時裝照，這一風氣延續到1920年代末，如《上海畫報》的頭版專刊女性照相，從名門媛女、交際花到妓女，一視同仁，這大約仍沾有民初平權觀念的流風遺韻吧。

1915年1月，上海商務印書館推出《婦女雜誌》，如發刊詞所說，亦以發揚「陰教」為宗旨，偏重灌輸知識與道德論述^⑤，在《婦女時報》之後佔據了新女性話語主流。學界對《婦女雜誌》已有不少研究，周敘琪在《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新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一書中對於該雜誌在民初所表現的方方面面言之甚詳。其「中心主旨是成就賢妻良母」^⑥，婦女教育的內容包括家政、個人妝飾、美容等，基本上是沿着《婦女時報》的路線^⑦。

如上所述，儘管共和政治舞台風雲詭譎，充滿波折，而一些上海知識份子在女權運動、大眾傳播、文學生產、都市發展等方面卻積極推進社會改良的議程。本文僅舉民國初年《民權素》、《禮拜六》、《婦女時報》等少數幾個雜誌，至於徐枕亞的《玉梨魂》，以及《眉語》、《鶯花雜誌》等如何在愛情與家庭的私密空間觸及人性反思的課題，從而更深刻體現了「共和」的範式轉型，尚需作進一步探討。

註釋

① 2011年11月25日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舉辦對於拙作《從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電影和文化的轉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的書評討論會，宋明煒教授擔任評講。其後他的評論，參見宋明煒：〈革命、共和與日常生活——談陳建華的書，以及再讀張愛玲的啟示〉，《書城》，2012年2月號，頁5-15。

② 僅筆者所見，有博耶(Alain Boyer)等著，應奇、劉訓練編：《公民共和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赫佐格(Don Herzog)等著，應奇、劉訓練編：《共和的黃昏：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7)；博比奧(Norberto Bobbio)、維羅里(Maurizio Viroli)著，楊立峰譯：《共和的理念》(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9)；歐陽軍喜等著，金沖及主編：《共和大業》(台北：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佩蒂特(Philip Pettit)著，劉訓練譯：《共和主義：一種關於自由與政府的理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劉訓練：《共和主義——從古典到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鄭辟瑞譯：《共和的危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伍頓(David Wootton)編，盛文沁、左敏譯：《共和主義、自由與商業社會，1649-177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劉小楓：《百年共和之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③ 參見《共和主義、自由與商業社會，1649-1776》，頁5。

④ 參見柯偉林(William Kirby)著，劉家峰譯：〈辛亥革命與中國的共和世紀〉，載柯偉林、周言主編：《不確定的遺產：哈佛辛亥百年論壇演講錄》(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頁131-40。

⑤ 韓平：〈我們的國號——略論新中國之國體與政體〉(2009年9月28日)，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10129704.html>。

⑥ 司馬遷：《史記·周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144。

⑦ 陳力衛：〈近代中日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影響——以「民主」與「共和」為例〉，《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期(2011年12月)，頁149-77。

⑧ 藍弘岳：〈十九世紀日本與中國政治思想之「共和」論述〉，《新史學》，第25卷第2期(2014年6月)，頁107-57。

⑨ 關於「民初共和政治的失敗」和「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誌》，拉開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

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頁274。金、劉把這兩者看作一種直線的過渡，似重複了「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的後設判斷，而遮蔽了複雜的歷史現場。

- ⑩ 高一涵：〈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新青年》，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頁1。
- ⑪ 參見李大釗：〈俄國大革命之影響〉(1917年3月29日)，載《李大釗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2。
- ⑫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頁244。
- ⑬ 劉訓練：《共和主義——從古典到當代》，頁3。
- ⑭ 行嚴：〈共和〉(1912年2月27日)，載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第二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頁48。
- ⑮ 參見Leigh K. Jenco, *Making the Political: Founding and Action i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Zhang Shizhao*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⑯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譯：《世界共和國政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11)；田中萃一郎著，畢厚編譯：《歐美政黨政治》(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
- ⑰ 康有為：《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上海：廣智書局，1916)，頁3。
- ⑱ 關於梁啟超與護國之役的言論，參見梁啟超：《盾鼻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
- ⑲ 參見魏宏運主編：《民國史紀事本末》，第一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頁494。
- ⑳ David Strand, "Introduction: Republican China", in *An Unfinished Republic: Leading by Word and Deed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12.
- ㉑ 參見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3-17。
- ㉒ 關於孫中山與「革命」話語，參見陳建華：〈辛亥，死活都要「革命」〉，《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1年10月號，頁57-66；〈孫中山何時自稱「革命黨」——早期思想地圖與「革命」指涉的勘探〉，載《古今與跨界——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頁60-84。
- ㉓ 參見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全國報刊索引》編輯部：《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
- ㉔ 徐忍寒：《申報七十七年史料》(上海：內部刊物，1962)，頁18。
- ㉕ 〈常識發刊詞〉，《申報》，1920年6月1日，第17版。
- ㉖ 老圃：〈喪心病狂問題〉，《申報》，1921年4月6日，第3版；〈取消北京政府〉，《申報》，1922年5月13日，第3版。
- ㉗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2003)。
- ㉘ 參見楊天石、王學莊編著：《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頁300。
- ㉙ 吳承烜：〈小說新報發刊詞一〉，《小說新報》，第1期(1915年3月)，頁1-2。
- ㉚ 參見陳建華：〈論文言與白話的辯證關係及中國現代文學之源——以周瘦鵑為例〉，《清華中文學報》，第12期(2014年12月)，頁309-71；〈周瘦鵑「影戲小說」與民國初期文學新景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2期，頁19-32；〈演講實錄1：民國初期消閒雜誌與女性話語的轉型〉，《中正漢學研究》，第22期(2013年12月)，頁355-86；〈拿破崙「三戴綠頭巾」——民國初期都市傳播文化的女權與民主傾向〉，《學術月刊》，2013年3月號，頁157-70。
- ㉛ 東園：〈女子世界弁言〉，《女子世界》，第1期(1914年12月)，頁2。
- ㉜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著，任生名譯：〈主導〉，載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頁9。

- ③ 湯哲聲說：「1872年至1897年這25年中，總共出現過5種文學期刊，其中3種實際上是《瀛寰瑣記》的改版；從1902年到1909年，據阿英在《晚清文藝報刊述略》中統計，共20種。而從1910年到1921年的11年間，文學期刊已達52種，是前面的一倍多。」參見范伯群主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新版，下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頁421。
- ④ 鄭逸梅：〈南社社員所著的幾種單行本〉，載《鄭逸梅選集》，第一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頁820。
- ⑤ 樂梅健：《民間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122-24。另如孫之梅指出，民初的文藝雜誌大多由南社社員主持，因此「南社與鴛鴦蝴蝶派小說又生發了『二圓相交』的關係，促成了近代小說創作的繁榮」。參見孫之梅：《南社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303。
- ⑥ 笑：〈革命與專制鬥〉，《時報》，1911年10月25日，第4版。
- ⑦ 悲秋：〈圖畫女子呈禁曼陀畫師不准再繪裸體文〉，《餘興》，第28期（1917年5月），頁12。
- ⑧ 張根仁、契北恭：〈祝詞〉，《女子白話旬報》，第3期（1912年11月），第1版。
- ⑨ 柳亞子：〈聞寧太一噩耗痛極有作〉，載柳無非、柳無垢選輯：《柳亞子詩詞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28。
- ⑩ 蔣箸超：〈序一〉，《民權素》，第1期（1914年4月），頁1-2。
- ⑪ 徐枕亞：〈序二〉，《民權素》，第1期（1914年4月），頁1-2。
- ⑫ 胡常德：〈序四〉，《民權素》，第1期（1914年4月），頁1-2。
- ⑬ 雙熱：〈獻為鼠界作討貓檄〉，《民權素》，第1期（1914年4月），頁5。
- ⑭ 枕亞：〈水族革命記〉，《民權素》，第1期（1914年4月），頁5-6。
- ⑮ 醒獨：〈黑甜鄉記〉，《民權素》，第1期（1914年4月），頁4-5。
- ⑯ 太炎：〈獄中與威丹聯句〉，《民權素》，第13期（1915年12月），頁1。
- ⑰ 參見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二十一世紀》，1993年10月號，頁39-51。
- ⑱ 參見陳建華：〈《申報·自由談話會》——民初政治與文學批評功能〉，《二十一世紀》，2004年2月號，頁87-100。
- ⑲ 鈍根：〈自由雜誌序一〉，《自由雜誌》，第1期（1913年9月），頁1。
- ⑳ 愛樓：〈專制傳〉、〈除三害說〉，《自由雜誌》，第2期（1913年11月），頁5、7。
- ㉑ 湯志鈞主編：《近代上海大事記》（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頁768。
- ㉒ 瘦鵑：〈《禮拜六》舊話〉，載王智毅編：《周瘦鵑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頁241。
- ㉓ 鈍根：〈禮拜六出版贅言〉，《禮拜六》，第1期（1914年6月），頁1。
- ㉔ 周瘦鵑在〈《禮拜六》舊話〉中說：「出版以後，居然轟動一時，第一期銷數達二萬以上，以後每逢禮拜六早上，中華圖書館的大門還沒有開，早有人在那裏等着買《禮拜六》咧。」參見瘦鵑：〈《禮拜六》舊話〉，頁241。
- ㉕ 參見趙孝萱：《鴛鴦蝴蝶派新論》（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頁147-226。近年來關於《禮拜六》的研究，參見劉鐵群：《現代都市未成型時期的市民文學：〈禮拜六〉雜誌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Mao Peijie, "The Saturday: Popular Narrative, Identity, and Cultural Imaginary in Literary Journals of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9); Luo Meng, "Saturday as the Dialogical Other: Rethinking the 'Popular' in Shanghai Literature (1910s-1920s)" (Ph.D. dis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 ㉖ 參見陳建華：〈民國初期周瘦鵑的心理小說——兼論「禮拜六派」與「鴛鴦蝴蝶派」之別〉，《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2期，頁37-49；〈抒情傳統的上海雜交——周瘦鵑言情小說與歐美現代文學文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頁1-18。
- ㉗ 關於中國婦女參政運動，參見鮑家麟：〈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思潮（1898-1911）〉、〈民初的婦女思想（1911-1923）〉，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十八編，下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935-63、965-96。另參見張玉法：〈中國婦女參政權的演變〉，載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I）：近代中國婦女與國家，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39-71。

⑤⑧ 〈女界代表張群英等上參議院書〉，《婦女時報》，第6期（1912年6月），頁21-22。

⑤⑨ 林宗素：〈女子參政同志會宣言書〉，《婦女時報》，第6期（1912年6月），頁17-19。

⑥⑩⑪ 金天翮：《女界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56-66；16-18。

⑥⑪⑫ 瘦鵲譯：〈泰晤士河畔女子要求參政之怒潮〉，《婦女時報》，第7期（1912年8月），頁9-13；13。

⑥⑬⑭ 〈編輯室之談話〉，《婦女時報》，第18期（1916年6月），頁95；96。

⑥⑮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⑥⑯ 樂梅健：《通俗文學之王包天笑》（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

⑥⑰ 如雲錦：〈掉經娘（女子職業之一）〉，《婦女時報》，第1期（1911年6月），頁20-23；秦蕙蓉：〈嘉定女子職業談〉，《婦女時報》，第3期（1911年8月），頁39-40；拳拳：〈閩南夫人之職業〉，《婦女時報》，第7期（1912年8月），頁48-51；晚秀：〈上海貧女生涯之調查〉，《婦女時報》，第18期（1916年6月），頁22-31；黎絮芳：〈天門婦女職業之調查〉，《婦女時報》，第20期（1916年11月），頁54-60。

⑥⑱ 參見Joan Judge, "Everydayness as a Critical Category of Gender Analysis: The Case of Funü Shibao (The Women's Eastern Times)"，〈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0期（2012年12月），頁1-28。

⑥⑲ 參見嫵靈：〈家政精明之我妻〉，《婦女時報》，第2期（1911年7月），頁19-20；徐一冰：〈理想中之新家庭〉，《婦女時報》，第4期（1911年11月），頁29-34；汪傑樑：〈理想的家庭模範〉，《婦女時報》，第5期（1912年1月），頁1-6；返真：〈論婦女之當為〉，《婦女時報》，第8期（1912年10月），頁8-14；晚秀：〈賢母良妻主義與救國問題〉，《婦女時報》，第18期（1916年6月），頁1-4。

⑦⑰ 〈上海婦女之新妝束〉，《婦女時報》，第1期（1911年6月），頁54。

⑦⑱ 秦芬蓉：〈女界之裝飾與國家經濟談〉，《婦女時報》，第3期（1911年8月），頁81-82。

⑦⑲ 參見「雲中飄渺之飛仙」圖，《小說時報》，第15號（1912年4月），兩女子名為湘妃閣和陳綠雲；「孫鳳雲和湘妃閣駕飛車」圖，《小說時報》，第16號（1912年7月）；「上海鮑金蓮之乘飛艇」圖，《小說時報》，第18號（1913年5月）；「蘇州金閶城飛車凌空之攝影」圖，《小說時報》，第22號（1914年5月）；「金閶名花駕飛車」圖，《小說時報》，第27號（1916年7月）。

⑦⑳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頁339-40。

⑦㉑ 〈婦女雜誌發刊辭一〉，《婦女雜誌》，第1期（1915年1月），頁1。

⑦㉒ 周敘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頁119。

⑦㉓ 在最近徐艷蓮的博士論文中，在科學常識、家政、食譜、美容四個方面對《婦女時報》和《婦女雜誌》作比較，以表格列出具體發表文章篇目。參見Yanlian Xu, "Alternative Voices on Chinese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A Study of Women Journals Edited by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Writers" (Ph.D. dis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105-15。